

相互混淆交错”时，著者以“良”字为例，作了详尽的分析（第 308 页）。到了“语法”部分，在说到“状语多样丰富”时，因举例涉及“良”字，又夹杂大段文字来分析其本始义、近引申义、远引申义，还列表整理出“良”的词义系统来（第 443 页）。此段文字不仅重复，而且与上下例句分析不相协调。

（二）个别内容不应以正文形式出现。如“汉字”部分在述及“汉字部首形、音、义的全面了解”时，著者将《说文》“540 部首的简要说明”“按笔画顺序整理排列”于正文之中。虽然“这部分很重要，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供随时查阅”的资料还是以“附录”列于书后为宜。

安徽大学中文系 白兆麟

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科学总结

《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张亦工、徐思彦、杨群、黄春生著。42 万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出版。

近读徐宗勉、张亦工等合著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深感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理论价值，且富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史学力作。作者在书中，凭其精湛的政治理论功底和翔实的历史资料，系统地总结了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49 年间国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全过程，并在人们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观念的形成，主要的不是来自自身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来自外国侵略的刺激。中国民主政治这种“外发后生”的状况，使得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程，较西方各国，无论在有关民主的认识和实践上，还是在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了极其复杂的关系。如，民主在中国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如何认识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等关系。这些在西方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无需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却显得异常的重要。如何梳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所遇的这些关系，揭示这些关系所蕴含的内在联系，不仅是我们总结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是今天最具借鉴意义之所在。该书结合国人对民主政治追求的实态，科学地阐释了上述关系，尤其是对以下几种关系的阐释，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1. 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所谓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所谓政治结构，指的是政治的法定制度。一般地说，一定的政治结构总是以一定的政治文化为其基础的。缺乏一定的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就不可能稳定、顺利地发展。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建设中，要正确地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并不容易。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就曾出现过两种偏颇的态度。一是看不到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间的联系，不顾中国的国情，一味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二是过分强调政治文化的作用，认为近代中国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在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先做培养民主政治文化的工作。究竟如何在实践层面上处理这二者关系呢？该书对此作了较为周到的阐述：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政治文化对政治民主的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政治活动家和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素养起着相当大的而且是直接的作用”。“近代中国民主力量的薄弱和政治民主化的艰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的落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前言第 17 页）第二，强调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基础作用，并不等于说中国的民主建设，要坐等民主政治文化完全发育之后才能进行。“民主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只有在民主政治的逐步实施中，才能培养和发展民主意识，也就是说，民主意识不会凭空产生，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才能学习民主的规范，提高民众的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民主制度也只有在实际操作运行中，才能不断发展完善。”（第 412 页）

应该说,正是基于上述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关系的正确认识,才使得该书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能作出深刻的分析。如对民初资产阶级党人尝试政党政治失败的分析,认为其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政治结构缺乏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持”(第142—143页)。再如对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和孙中山“训政”论的评价,认为他们在强调政治文化的养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第180—181—191页)。

2. 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的关系。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与民主革命的过程几乎是同时肇始的。因此,正确认识这二者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以及顺利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极具意义的。然而,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人们对这二者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一部分人认为革命必然产生专制,从而把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对立起来。还有些人,则看不到二者间的差异,把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等同起来,结果妨碍、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建设。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二者的关系呢?该书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有着两面关系。

第一,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不仅在于民主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民主性的政权,而且在于民主革命有力地破坏着封建主义的旧事物,有利于民主启蒙和民主秩序的形成。”(前言第14页)第二,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间还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一般地说,革命总是需要高度集中统一,需要绝对权威,需要发动千百万群众,需要彻底破除旧的秩序和法律。在革命过程中高扬的理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服从集体、崇拜领袖的行为习惯,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平等、自由观念,以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相冲突的(前言第14页)。

应该说,上述关于民主革命与民主建设两面关系的论述,是符合中国政治发展实情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在该书中,高度颂扬了革命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与意义。如对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该书认为:“这场革命虽然中途夭折了,但它第一次在广大劳动人民中传播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并给中国政治引进了一系列新的模式和制度。”(第263页)同时,作者根据革命与民主间的差异,还提出了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如何转变革命观念,增强民主意识的命题。

3. 政治改良与民主建设的关系。如何正确地估量政治改良势力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一个话题。该书在充分估量革命对中国政治民主化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把改良派要求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和活动也纳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轨道中,并对改良势力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作用作了较为切实的评价。例如关于维新派的评价。该书充分肯定了维新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先导地位。该书认为,维新派的理论主张中,尽管有许多不合中国实情的内容,但“他们留下的民权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所聚集的民主力量,连同变法失败的教训一起,都成为此后中国政治民主化获得新进展的重要因素”(第34页)。

再如关于20世纪初年立宪派与革命派论争的评价。大凡学习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05年至1907年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了一场历时两年的论战。对于这场论战,以往的史书大多着眼于要不要革命问题,说革命派如何如何有理,立宪派如何如何错误。该书认为,如果从全面的观点来论述这场论战,以往的史书对立宪派的评价,似乎有失公允。作者在书中指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这场论战,是围绕要不要推翻清王朝以建立“共和立宪”制问题而展开的。从要不要、能不能进行革命这个总题目上看,立宪派无疑是错了。“但是,在这个总题目下,双方还对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反复的争论,而在这方面,立宪派的意见虽然也有错误,但却比革命派的意见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预见性。”(第52页)因此,如果全面地来看这场论战,双方的见解和主张都各有是非长短。革命派知道必须用革命扫除旧的专制势力的障碍,为民主化开辟道路,却看不到民主化本身是一个长时间的渐进的建设和积累的过程,以为可以速成,而立宪派正好相反。“双方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一心想把古老、专制的中国变为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都属于民主派”(第63页)。

这些论断，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4. 党的领导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不要党的领导？这一问题，自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主张后，一直成为国人谈论的话题。事实上，能否正确认识这一关系，不仅涉及到历史上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该书对此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该书指出，在中国，“以党治国”，这种由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党用集权的手段引导人民逐步走向民主的构想，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的中国，“无疑有着很大的合理性”（第 191 页）。“一党执政，与民主政治并非水火不容，与独裁统治也没有天然的联系。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度里，通过执政党的领导，发展社会经济、文化，逐步提高民众的政治素养和民主意识，不失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有效途径。”（第 344—345 页）诚然，“‘以党治国’与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治有原则的区别，但二者都实行集权政治，因而，如果没有适当的党内权力制衡机制，‘以党治国’是极容易演变为专制独裁的”（第 309 页）。这些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总之，通览该书，尽管有些问题，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深化，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但确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且有着现实借鉴意义的好书，值得一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朱汉国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方如金等著。30万字。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9 月出版。责任编辑：张秀平。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囿于截然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对于浙东学派的整体研究几近空白，只有各分支学派的个案研究，且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文革”中，南宋浙东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有的形象被扭曲、神秘化，有的被丑化，已经完全失去了学术上的价值。“文革”后，学术界冲破了“左”的束缚，为南宋浙东学派的正常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各方学者对南宋浙东学派和陈亮、吕祖谦、叶适等人的研究，逐步形成共识：即尊重历史事实，全面地、客观地论述这一学派及各个思想家的思想、政绩等，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方如金教授等著的这部专著，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大致有以下三个特色。

（一）该书将陈亮和浙东学派置于历史过程中进行全面系统、实事求是的综合考察。

首先是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其中包括探讨“浙东学派”概念的由来及其涵义，南宋浙东学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浙东学派中三个分支即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金华学派的创立、形成和发展情况。还指出，在这三个分支学派中，“金华学派特别是其中的吕学，基本上属于理学的一支”，“但永康、永嘉学派是当时反理学的主流”（第 39 页）。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除论述唐仲友和吕祖谦两人的学术主张外，并总结出该学派的四个明显特点：1. “该派学者多博学多识，具有不私一说而兼取诸家之长的治学作风”；2. “多重务实致用，不尚空言”；3. “多注重历史研究，讲究古为今用，史著颇丰”；4. “比较重视本乡前贤的成就，倡导乡土史地研究”。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来自各方面的影响，金华学派的学术特色也在不断变化。大致上，先是偏向于文学，继而误入佞佛佞道的歧途，而该学派亦在这种变化中渐趋衰微。”（第 37 页）其次是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渊源，细致分析该学派与传统儒学、其他传统思想以及浙东传统学术的关系；探讨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精神，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浙东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再次是理清陈亮与金华学